

规模较小的左派组织，持亲苏联立场，亦不主张乌克兰独立。但在冷战对峙开始后，这些左派组织生存空间日趋狭小，最终陷于瘫痪，¹

在导致前苏联解体的诸多原因中，各加盟共和国民族意识的增强以及民族问题的激化是不可忽视的两个重要因素。² 海外乌克兰人，包括美籍乌克兰人的民族主义活动对乌克兰上述因素的影响或许非常有限。但是，民族认同往往使得境外民族主义的宣传及其它活动对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或其部分成员有可能产生很强的影响力，日益发展的互联网以及各类现代媒体则会强化其作用。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做好民族工作，是当代多民族国家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论 文】

语言政策、民族主义思潮与前苏联的解体

田 鹏³

摘要：加盟共和国民族意识的增强及民族问题的激化是导致原苏联解体的两个重要因素。本文系统分析了前苏联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与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原苏联民族语言政策存在如下失误：一是语言政策与宪法原则及苏共的民族政策指导思想不一致，存在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使得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情绪具有正当性并对其有很大程度的强化作用；二是过分强调语言政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作用；三是双语政策仅针对非俄罗斯民族，不利于俄罗斯民族与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交流。这些失误强化了加盟共和国已存在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苏联解体的文化因素之一。

关键词：语言政策 民族主义 乌克兰 苏联

一、引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或“苏联”）是一个有着独特政治框架的联邦制国家。在沙俄时代，各民族地区处在沙俄政府的高压统治下。十月革命前后，一些民族地区纷纷独立，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而后与俄罗斯联合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盟宪法规定，各成员国地位平等，具有高度自治权，包括主权，且有退出联盟的权利，⁴ 这有别于世界其它任何联邦制国家的组成原则。⁵ 不过，联盟宪法如此规定，并非当时苏联主要领导人列宁及斯大林倾向于如此，而是若不以具有如此特征的联邦制建国，那些业已独立的苏维埃国

¹ Orest Subtelny, *Ukrainians in North America---An Illustrated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p.130—139.

² 参见：1.潘广辉 吴婧，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欧、美学界的研究，载《世界民族》，2006年第1期，第1—15页。2.张骥 齐长安，苏联解体的文化原因分析，载《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第33—35页。

³ 田鹏，博士，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丝绸之路欧洲研究联合中心，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人类学系访问学者（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

⁴ 苏联宪法（1977年版）第72条：“加盟共和国享有自由脱离联盟的权利”及第76条：“加盟共和国具有主权，并与其它苏维埃加盟共和国联合起来。” Boris Toporin, *The New Constitution of USSR*, Progress Publishers, 1987, pp 284—287. 本文引用的外文文献，若无特别说明，均由本文作者译为中文。

⁵ 此处“有别于其它任何联邦制国家的组成原则”，不仅仅是指其成员有脱离联盟的权利。Richard Pipes 分析了1918年苏维埃俄罗斯宪法在起草过程中关于联邦制组成原则的讨论过程。在以经济、地理、族群或者历史区域等多种方案中，最终确定以民族地域自治为原则建立联邦制。Richard Pipes 认为，苏维埃俄罗斯是以民族原则作为联邦结构基础的第一个现代国家。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110—112.

家便不大可能与俄罗斯联合起来组建联盟。按照列宁的设想，这种联邦制只是权宜之计，最终应过渡到完全的统一。¹ 然而，自苏联成立后直至解体，联盟宪法中关于各成员国具有主权且可自由退出的条款一直没有改变。因此，在苏联社会政治动荡的 1991 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联合乌克兰、白俄罗斯共同宣布“苏联解体”并不违反苏联宪法。从理论上讲，由时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应该更为合适，但戈尔巴乔夫反对苏联解体，而俄罗斯、乌克兰及白俄罗斯同属斯拉夫文化，是原苏联最为核心的三个成员。这三个成员国退出联盟，苏联事实上就已经解体了。

原苏联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在战胜轴心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二战结束后，苏联曾是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舞台因而发生巨变。国内外学术界虽然在分析苏联解体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一般认为下列因素是造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苏共中央民族政策的失误、加盟共和国民族自我意识增强、原苏联联邦制变形、民族经济利益冲突、人口迁移政策失误、俄罗斯联邦的离心倾向、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以及外部因素的推动与民族问题的激化等。² 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削弱了苏共的核心领导作用，使得苏联解体最终不可避免。³

民族问题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分析前苏联民族矛盾，多以政治、经济等为切入点，虽然也有涉及文化因素的研究，但系统、翔实联系前苏联民族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进行分析的研究尚未见到。本文拟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系统地探讨前苏联语言政策失误与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联系，并为我国民族研究提供借鉴。⁴

本文认为，原苏共中央在民族语言政策⁵存在如下失误：一是语言政策与宪法原则及苏共的民族政策指导思想不一致，存在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二是过分强调语言政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作用；三是双语政策仅针对非俄罗斯民族，不利于俄罗斯民族与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交流。这些失误强化了已存在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苏联解体的文化因素之一。本文拟系统归纳前苏联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分析其失误与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鉴于乌克兰与俄罗斯同属于斯拉夫文化，其人口规模仅次于俄罗斯，且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一起在 1991 年宣布前苏联解体。因此本文在讨论时，较多引用了乌克兰的相关材料。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分析第一个失误，对其余两个失误仅作简要概括。

二、原苏联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对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

1、苏联建国初期至 1930 年代中期的语言政策

在十月革命之前，长达三个世纪的扩张政策使得沙皇俄国的民族构成及语言使用十分复杂，有大约 180 种由不同民族使用的各种语言，⁶ 这些语言分别属于印欧、阿尔泰、乌拉尔以及伊利

¹ 列宁认为：“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那就必须力求达到愈来愈紧密的联邦制同盟”。见：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 年）》，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2012 年 4 月 23 日查询）：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200605.htm>

² 参见：1.潘广辉 吴婧，“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欧、美学界的研究”，《世界民族》2006 年第 1 期，第 1-1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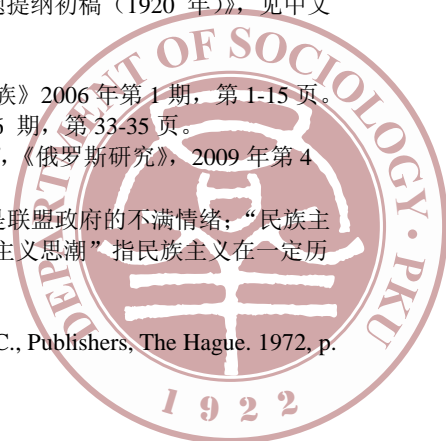
2. 张骥 齐长安，“苏联解体的文化原因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03 年第 6 期，第 33-35 页。

³ 参见：朱秀芳，“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历史诠释——再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121-136 页。

⁴ 本文中，“民族情绪”指由于本民族合法权利未得到尊重而引发的对政府尤其是联盟政府的不满情绪；“民族主义”指要求维持本民族语言、文化及历史在其加盟共和国的主导地位；“民族主义思潮”指民族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突出表现；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指脱离联盟的舆论或行为。

⁵ 为避免重复，下文多以“语言政策”代替“民族语言政策”。

⁶ E. Glyn Lewis, *Multilingu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Netherlands: Mouton & Co. N.C., Publishers, The Hague. 1972, p. 17.



比亚高加索等多个语系。其中印欧语系的东斯拉夫语族包括了俄语，以及与俄语十分接近的乌克兰语以及白俄罗斯语。根据 1926 年苏联的人口统计，以这三种东斯拉夫语为母语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以及白俄罗斯人分别占苏联总人口的 52%、21%、3%，在当时苏联人口中列前三名，其人口之和占当时苏联人口的 77%。¹ 可以认为，这三者是前苏联的核心成员。

沙皇俄国时代的语言政策与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语言政策大体一致，即力图通过语言同化来构建文化共同体。19 世纪中叶，沙皇政府对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颁布了一系列禁止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法令，推行所谓“义务国语制”，大力推广俄语，压制少数民族语言。各少数民族只能学习、使用俄语，其它民族语言不得用于教学及出版文艺作品。² Michael G. Smith 认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及意大利语言同化政策相对成功的经验，成为沙俄政府推广语言同化政策的动力。³

苏联成立后，宪法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是一个由具有主权、平等的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盟，这也成为苏联民族政策及语言政策的理论基石。列宁明确指出：“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纲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享有任何特权”，⁴ 并要求在法律上“废除任何语言的特权，实现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经费。”⁵ 可见，列宁明确反对利用国家权力来推行某一特定语言，也不主张指定某一语言为国家语言。他认为，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发展自然会推动一种应用性最广、使用最为便利的语言成为共同语言，采用行政权力强力推行某种语言只能引起持其他民族语言的人民的反感。⁶ 列宁的民族语言政策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反对歧视和限制任何民族语言文字，不允许任何民族语言享有任何特权。第二，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三，各民族在自愿的基础上相互学习语言文字。⁷

十月革命胜利后第 8 天，即 1917 年 11 月 15 日，苏维埃政府就颁布了“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宣布各民族的平等和所有少数民族自由发展的权利。1918 年 10 月 31 日，内战还未结束，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即颁布“关于少数民族学校”的决定。同年，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属下成立了用俄国各民族语言出版书籍的民族委员会。20 年代，苏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广泛使用不同民族语言教学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在 20 年代初期，各民族语言取得了与俄语相同的法律地位。⁸

20 年代至 30 年代中期，苏联政府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如为发展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化，政府派出语言学家，帮助那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民族文字。到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政府先后给 52 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文字，用 67 种民族语言进行电台广播，用 50 种民族语言上演戏剧，用 55 种民族文字印刷报纸，用 46 种民族文字发行杂志，用 52 种民族文

¹ E. Glyn Lewis, *Multilingu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Netherlands: Mouton & Co. N.C., Publishers, The Hague. 1972, pp. 25-44.

²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文出版社，2003 年 4 月，第 3 页。

³ Michael G. Smith, *Language and Power in the Creation of the USSR 1917—1953*,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8, pp 15—17.

⁴ 《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49 页。

⁵ 《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7 页。

⁶ 《列宁全集》第 1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53 页。

⁷ 1. 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第 488 页；2. Lenore A. Grenoble, *Language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p.36

⁸ 各加盟共和国也先后通过立法的形式宣布民族语言是国语或较重要的语言。例如：拉托维亚（1918 年 1 月）、乌克兰（1919 年 12 月）、亚美尼亚（1920 年 12 月）、巴什基尔（1921 年 7 月）、楚瓦尔（1922 年 4 月）、阿塞拜疆（1924 年 6 月）和白俄罗斯（1924 年 7 月）等共和国都通过了语言平等权利的决议。公文和教育工作采用的语言主要取决于公民的民族成分，教育用母语进行。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文出版社，2003 年 4 月，第 4—5 页。



字出版中学教科书，并在民族地区创办学校，建立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¹可以看出，苏联建国初期的语言政策较好地体现了列宁民族语言政策的指导思想：强调语言平等，提倡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文字。由于俄语事实上的特殊地位，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文字，主要是指非俄罗斯民族学习俄语。

但也有观点认为，苏联成立后对不同民族身份的建构，使得普通民众原本已经模糊的民族身份意识又逐渐清晰起来。²以民族构成作为冠名加盟共和国的组成依据，以及在初期推广的平等语言政策会无疑会强化各加盟共和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容易引发民族主义思潮，而这事实上不利于原苏联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

2. 30年代后期至斯大林去世

斯大林显然意识到苏联的联邦制，以及各加盟共和国以其民族语言为官方语言会强化民族意识，且不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1929年，斯大林发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其中对语言发展的前景有如下描述：

“当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十分巩固，……各民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本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各民族未来的大致图画，各民族在将来融合的道路上发展的图画就是如此”。³

这体现了斯大林在民族语言政策领域的指导思想：民族语言的消亡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民族融合的实现。30年代后期，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巩固，苏联政府于是开始在语言政策上体现建设所谓“苏联民族”的努力。⁴

在推广俄语之前，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政府曾试图创立并推广一种“融合语言”，即英语、法语、俄语甚至包括世界语的混合语言，来避免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斯大林于1935年提出这一思路，之后由语言学家 Drezen 负责组织研究实施。然而1936年春天，“融合语言”即宣告破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愿意接受这一新“语言”。“融合语言”失败之后，苏联政府开始将使用拉丁字母的少数民族语言逐渐改为使用俄语字母。1936年5月，俄罗斯苏维埃首先评估了其境内少数民族使用拉丁字母的现状并批准以新的规范俄语字母来代替拉丁字母。1937年年底，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内的所有少数民族文字都由拉丁字母改为俄语字母。1938年3月，苏共中央及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在各加盟共和国及各地区学校开设俄语必修课”决议，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学生小学阶段学习结束时，应具备基本的俄语说读写的能力，并满足从事办公室类工作的需要。1939至1940年，除格鲁吉亚及亚美尼亚外，所有使用拉丁字母的加盟共和国都转用俄语字母，以便俄语教学的实施。⁵

¹ 杨玲：“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错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第115页。

² 这里主要指与俄罗斯语言及文化都十分接近的乌克兰族与白俄罗斯族。Roman Szporluk 在 1975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俄罗斯人与格鲁吉亚人、拉脱维亚人或者乌兹别克人完全不同：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自基辅罗斯时代之后 (kyivan Rus) 开始融合，至十月革命之前已长达三个世纪以上。由于密切的相互接触与共同生活，俄罗斯及乌克兰人曾被认为属于同一民族。在苏联其它民族中，只有白俄罗斯人有类似感受。因此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或者其中的绝大部分，并不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而是将乌克兰看成自己的祖国。只是到了 20 世纪之后，那种原本只在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的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的民族区别，渐渐成为普通大众的意识。其原因就是 20 世纪之后对两个民族的人为区别。见：Roman Szporluk, *Russians in Ukraine and Problems of Ukrainian Identity in the USSR. First published in Ukraine in Seventies, 1975, p72.* 引自：Roman Szporluk, *Russian,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2000 pp 71-107. 说明：Roman Szporluk,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乌克兰、俄罗斯、波兰史，以及马克思主义、东欧民族主义。

³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斯大林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99-300 页。

⁴ Roman Szporluk 认为，自斯大林开始，苏联政府事实上一直将通过语言同化、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阶级团结作为将各民族融为一体的风险最小的办法。见：Roman Szporluk, *Nationalities and the Russian Problem in the USSR, 1973, pp 17-18*，载 Roman Szporluk, *Russian,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2000, pp 1-27.

⁵ Michael G Smith, *language and Power in the Creation of the USSR 1917—1953*,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根据现有史料（包括西方学者的研究¹），尚未发现最初 4 年加盟共和国对该语言政策的强烈反对。这里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自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强势领导人，尤其是30年代苏共党内进行的肃反运动压制了不同观点；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然而，从1946年开始，乌克兰党中央开始的反民族主义斗争显示不同声音的出现：从1946年至1948年，乌克兰党中央曾8次通过反对民族主义倾向的决议，并于1946年7月及1950年1月两次在全国公开批判了部分作家的所谓民族主义思想。与此同时，俄语教育在各加盟共和国全面展开。即使在像亚美尼亚这样的加盟共和国，其母语原来在国家各个领域都占主导地位，从1946年开始，俄语从小学二年级也开始成为必修课。而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历史教材都以俄罗斯为主进行重新编写。1952年10月苏联19大召开前后，苏联党中央进一步强化了反对民族主义倾向的运动。²

苏共中央希望通过改变语言政策，逐渐使俄语成为全苏联的通用语言，这其实是合理的。³ 但问题在于，新语言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事实上违背了联盟宪法的原则，⁴ 也违背了列宁民族语言政策的指导思想。而语言教学与各民族文化与历史密切相关，容易引起非俄罗斯民族知识分子民族情绪的反弹。在斯大林时代，新语言政策的推行还比较顺利，除了上文提及的因素外，还有一个

Gruyter, 1998, pp. 155-156.

¹ 指以下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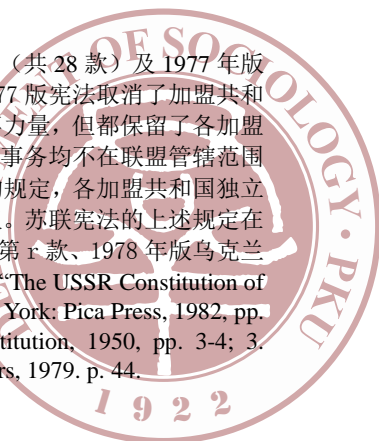
1.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2. E. Glyn Lewis, *Multilingu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Netherlands: Mouton & Co. N.C., Publishers, The Hague. 1972.
3. Isabelle T. Kreindler, ed.,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Soviet National Languages: 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erlin, 1985.
4. Lenore A. Grenoble, *Language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5. Michael G Smith, *language and Power in the Creation of the USSR 1917—1953*,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8
6. Richard Pipes, *Russian Under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4.
7. Roman Szporluk, *Russian,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dard University, 2000.

²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p.101—106.

³ 苏联成立后，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及人口流动增多，客观上也需要俄语成为苏联的通用语言。斯大林也没有掩饰自己将俄语普及为统一语言的想法。1950年5—7月，苏联《真理报》开展语言学问题大讨论，斯大林亲自参与，通过发表文章及并采用回答读者来信的形式表明自己的观点。讨论结束后，1950年8月，《真理报》将斯大林参与此次讨论发表的文章及问答以《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出版单行本。斯大林曾两次以较长篇幅提及语言的统一问题。一是引述马克思有关论述：“引证另一句话，马克思在谈到统一的民族语言形成道路的问题时说：‘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另一处引用列宁相关论述。列宁在苏联建立初期，坚决主张各民族语言平等，反对给任何语言以特权。对此，斯大林特别指出“至于说列宁似乎否定了统一语言的必要性，那么就应当听一听列宁说的下面的话：‘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2012年4月17日查询）：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Stalin/mia-chinese-stalin-1950.htm>

⁴ 这里指联盟介入了本应由各加盟共和国管辖的教育事务。1936年版苏联宪法第14条（共28款）及1977年版苏联宪法第73条（共12款）规定了联盟政府的管辖权。与1936年版宪法相比，1977版宪法取消了加盟共和国以下权力：有权直接与其它国家签订条约、互派外交及领事代表及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但都保留了各加盟共和国制定自己宪法，拥有主权及退出联盟的权利。在两个版本的苏联宪法中，教育事务均不在联盟管辖范围内，且没有关于俄语地位的任何说明。而1936年版宪法第15条及1977年版第82条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其管辖范围内各项权力。也就是说，教育领域应由各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管辖权。苏联宪法的上述规定在加盟共和国宪法中也有相应条款。以乌克兰宪法为例，1939年版乌克兰宪法第19条第1款、1978年版乌克兰宪法第72条第13款均规定，教育事务由乌克兰独立管辖。参见：1. Aryeh L. Unger,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36 &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77”, i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New York: Pica Press, 1982, pp. 142-142, pp. 246-249; 2. *Ukrainian Constitution (1939)*, The American Russian Institution, 1950, pp. 3-4; 3. *Constitution of the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1978)*, Politvidav Ukraini Publishers, 1979. p. 44.



重要原因，应该是二战期间俄罗斯在战胜纳粹德国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提高了俄罗斯族在苏联各民族心中的地位。有学者认为，1945年至1948年期间，俄语在苏联成为广受尊敬的语言。当然，这与苏联政府发起的推广俄语运动不无关系：为了让各民族民众读到俄语读物，政府大量出版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的作品，仅在1949年一年就出版达4500万册。学校的俄语课教学更被赋予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的使命。¹

3. 赫鲁晓夫时代及以后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期间，苏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措施。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抨击斯大林违背列宁确立的民族政策，声称社会主义并不是要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别，而是要繁荣非俄罗斯民族文化。² 当年6月，苏联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报》(Kommunist)全文发表了此前从未公开过的列宁“遗言”。“遗言”中，列宁指出要着重提防并反对大俄罗斯主义，而且“在向少数民族让步以及宽容方面，应该多做一些”。³ 苏共二十大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苏共中央将在民族政策上彻底纠正斯大林时代的做法。这无疑会强化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意识，并波及到民族语言政策领域，使得在斯大林时代受压制的反对意见公开化，而事实也证实这一点。这里举两个例子：

1956年10月，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召开上千人参加的乌兹别克知识界大会，时任乌兹别克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 Nuritdin Mukhitdinov 在会上宣布将为在斯大林时代遭迫害的乌兹别克作家及干部平反。他还明确指出：一直被许多苏维埃作家描述为落后地区的中亚其实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最古老的中心之一”。他号召乌兹别克知识界要承担发展民族文化、记载其精彩历史及培养民族干部的责任，并向参会者保证，过去在民族政策上所犯的错误，以后再也不会重犯。⁴

在乌克兰，人们最初对苏共中央的“去斯大林化”将信将疑，但随后“各种抱怨以及要求如潮水般出现——一如人们预料的那样——是在文化领域……诸如‘保卫乌克兰语言’、‘讲乌克兰语’等口号在乌克兰越来越频繁地被人提起”。⁵ 斯大林时代被噤声的政治及文化界名人重新活跃起来，乌克兰语言、文学、经济以及法律方面期刊及杂志纷纷涌现，复兴乌克兰文化的各类活动也得到了乌克兰官方默许。1958年2月6日，乌克兰官方报纸《乌克兰真理报》(Pravda Ukrainy)发表署名文章，对俄语将来有可能替代乌克兰的前景表示担忧。⁶

上述对俄语化的质疑，主要针对俄语在各加盟共和国使用日益广泛、少数民族语言受到限制、以及学校教学中忽视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现状。自1938年起逐步确立、已经延续了近二十年的双语教学模式，即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学习俄语的做法，并没有受到影响。

而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却开始强化以加强俄语教学为途径的“民族融合”之路。1958年8月11日，苏共中央机关报《共产党人报》(Kommunist)发表署名文章，认为民族政策的重点应从鼓励发展各民族文化调整为加速民族融合，俄语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强有力的交流工具。文章批评一些少数民族同志，在经济以及干部政策上片面强调民族利益，在处理与文化有关的问题时违反党性原则。文章提出非俄罗斯族不应过分强调自己的民族特征，应该鼓励任何能促进吸收

¹ Michael G Smith, *Language and Power in the Creation of the USSR 1917—1953*,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8, p164.

²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秘密讲话，抨击斯大林粗暴践踏列宁确立的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声称社会主义“并不是要消除各民族之间的不同”，而是要“繁荣”非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见：Leo Gulikow, ed., *Current Soviet Policies II: Documentary Record of the 20t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1985, pp. 52-53.

³ 见：Kommunist, no.9, 1956. 引自：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119.

⁴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p.121-122.

⁵ Orest Subtelny, *Ukraine — A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9, pp. 501-502.

⁶ Roman Solchanyk, *Language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in Isabelle T. Kreindler, ed.,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Soviet National Languages: 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erlin, 1985, p.74.



俄罗斯文化的努力。¹

3个月后的1958年11月，苏共发布了教育改革方案。而其中关于俄语教育的条款“Thesis 19 草案”提出，儿童学两门语言再加一门外语负担过重，要求家长做出选择：**将孩子要么送到以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要么送到以俄语教学的学校。在俄语学校，民族语言将不再是必修科目。在民族语言学校，理论上俄语也不是必修课。**显然，这是一个不平等的选择，因为出于为孩子的未来着想，家长很可能选择俄语学校。这将会改变自1938年以来各加盟共和国的语言教学模式：即学校采用民族语言作为教育语言，俄语是一门必修课。²

“Thesis 19 草案”公布伊始，就遭到绝大部分非俄语加盟共和国反对。1958年12月，最高苏维埃讨论“Thesis 19 草案”时，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吉尔吉斯均表示反对。格鲁吉亚代表 I.V. Abashidze 的反对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警告说：“我们不能以允许在俄语及民族语言之间选择一个的方式来使俄语及民族语言对立起来。”草案未获通过。会议遂将草案其交由各加盟共和国自行决定。³

在苏共中央的压力下，“Thesis 19 草案”先后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获得通过。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定于1959年3月讨论该草案，乌克兰全国作家协会于是定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开会之前召开乌克兰第四次全国大会。协会主席 Bazhan 在大会发表主旨讲话，他引用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论述来支持维护乌克兰语言地位的正当性。大会通过决议，谴责“Thesis 19 草案”。但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将“Thesis 19 草案”融合在一项总的教育改革方案中，并没有对其单独讨论。最终该教育方案获得通过并于4月17日在乌克兰开始实施。⁴

至1959年夏天，仅余两个加盟共和国，即阿塞拜疆及拉脱维亚没有通过该草案。6月，苏共中央换掉了大部分阿塞拜疆籍党的高层领导，而被革职的第一书记 I. Mustafeev 则被指控渎职，其中一条罪责是“在原本思想完全统一的语言问题上引起混乱”；另外一名被撤职书记则被指控“人为区分本地及来自其它地区的干部”。11月，拉脱维亚党中央书记 Kalberzins、总理 Vilis Lacis 等被撤职。除语言问题外，苏共中央还指责拉脱维亚领导层在经济政策上犯有错误。⁵至此，苏共中央提出的“Thesis 19 草案”在所有加盟共和国全部通过。

可以看出，苏共20大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领导的苏共，先是批判、清算斯大林背离列宁民族路线，声称要鼓励发展各民族文化，这无疑成为各加盟共和国民族情绪高涨的重要原因。但之后不到两年，便提出目的在于促进民族融合的语言改革方案“Thesis 19 草案”。在遭到各加盟共和国强烈反对、在最高苏维埃召开的相关会议没有通过的情况下，以将该草案交由各加盟共和国自行决定为名，通过施加压力，直至调整加盟共和国领导层来强行通过该草案。

赫鲁晓夫之后的其他前苏联领导人，延续了通过推广俄语、以利于加快民族融合的指导思想。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强化了俄语作为苏联人民“第二母语”的努力。1978年10月，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强化加盟共和国俄语教学的若干措施”，在加盟共和国采用俄语为教学语言的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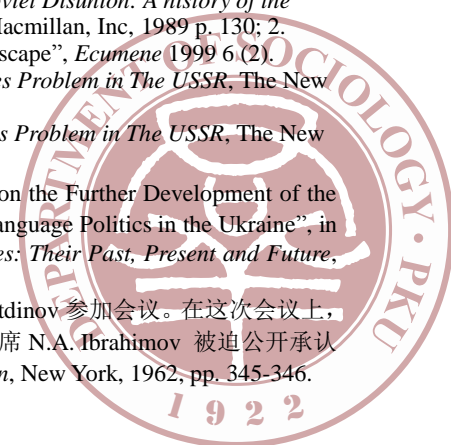
¹ 该文作者 Bobodzhan Gafurov，塔吉克人，在斯大林时代曾长期担任塔吉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发表该文时为苏维埃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参见：1.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 130; 2. James Bell “In Uzbekistan : Symbolic Tensions In Tashkent ’S Official Public Landscape”, *Ecumene* 1999 6 (2).

²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p 131.

³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 132-133.

⁴ 该教育法案的英文名称是 “On Strengthening Ties between School and Life and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krainian SSR”. 见：Roman Solchanyk, “Language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in Isabelle T. Kreindler, ed.,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Soviet National Languages: 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erlin, 1985, pp.75-77.

⁵ 1959年6月17-18日，阿塞拜疆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会，苏共中央委员 Mukhitdinov 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阿塞拜疆党中央大部分领导人都被撤换。12月11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 N.A. Ibrahimov 被迫公开承认他“在语言问题上犯了诸多错误”。Wolfgang Leonhard, *The Kremlin Since Stalin*, New York, 1962, pp. 345-346.



校实施新的教学大纲，进一步强化俄语教学，并在俄语不是主要教学语言的民族语言学校设计了新的俄语教学大纲。¹ 该措施可以视为赫鲁晓夫时代“Thesis 19”条款的进一步延伸。

三、结论与思考

从第二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从斯大林时代苏共中央开始调整语言政策，到赫鲁晓夫时代提出的“Thesis 19 草案”，都引起了加盟共和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情绪。在斯大林时代，由于上文提及的多种原因，这种情绪尚未公开爆发。而在赫鲁晓夫时代，由于苏共中央对于斯大林背离列宁民族路线的批判，以及之后自相矛盾的政策导向，引发了部分加盟共和国民族情绪的强烈反弹。从现有文献看，各加盟共和国强烈的民族情绪主要来自知识分子群体，也包括各加盟共和国领导层。在赫鲁晓夫时代，虽然苏共中央通过施加压力乃至撤换主要领导人的方式迫使各加盟共和国通过了遭到广泛反对的语言改革方案，并以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思想”压制了加盟共和国民族知识分子民族情绪的反弹。但是，苏共中央能够通过组织管理手段，例如撤换加盟共和国主要领导人来实现其既定政策，但对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反对意见，虽然可以通过批判，乃至审判压制其声音，却不可能像斯大林时代那样使其噤声。例如在乌克兰，对于苏共中央语言政策改革的公开反对意见一直都在持续。方案通过后第4年，1963年2月11-15日，乌克兰知识界在首都基辅召开全国大会，与会者一致谴责了现行的语言政策，呼吁在乌克兰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教育以及文化的领域使用乌克兰语，并将呼吁书递交给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²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苏共中央自斯大林开始的对语言政策的调整，尤其是赫鲁晓夫时代语言改革方案，事实上对于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由于苏共中央的政策调整缺乏宪法依据，³ 也违背了列宁提出的民族政策，从而使得民族知识分子的呼声成为一种被压制的正当诉求，产生了很强的感召力。例如，1965年年底，乌克兰知名文学批评家及反对派知识分子 Ivan Dziuba 向乌克兰党中央及国家领导人转交了他在监狱中完成的《民族融合还是俄罗斯化》一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该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角度，阐述了列宁主义民族政策并分析了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等偏离列宁民族政策的错误做法。该书以大量篇幅批驳了苏联的语言政策。作者写道：“我们不得不指出，从形式上以及法律上乌克兰语言当然拥有全部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乌克兰语的二等地位……让人不得不产生怨恨。”收到该书后，乌克兰党中央以及政府在小范围内（包括乌克兰25个州的主要领导）散发了该书，该书后流传到上述范围之外。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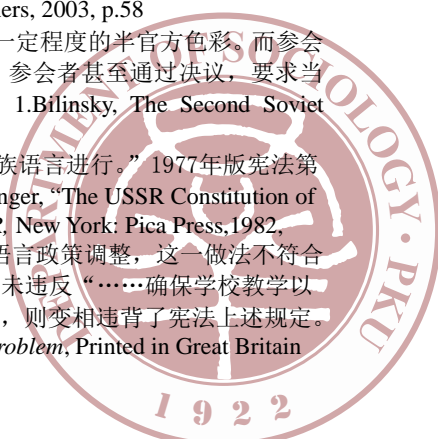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认为，语言政策背离宪法原则以及理论层面的民族政策，使得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情绪具有正当性并对在很大程度上对其起到了强化作用，是苏共中央在语言政策方面的主要失误之一。假如前苏联能够修改宪法，改变原有的联邦制性质，取消各加盟共和国的主

¹ Lenore A. Grenoble, *Language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p.58

² 这次持续5天的大会由基辅大学及乌克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共同发起，可见其一定程度的半官方色彩。而参会者主要包括语言学家、大学教师、作家以及出版、报纸、广播电视从业人员。参会者甚至通过决议，要求当面向乌克兰党中央及政府表达反对俄语化、提高乌克兰语的四项诉求。参见：I. Bilinsky, *The Second Soviet Republic*,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33-34.

³ 关于学校教学语言，1936年版苏联宪法第121条规定，“……确保学校教育以民族语言进行。”1977年版宪法第45条规定：“……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学校教学以民族语言进行。”Aryeh L. Unger,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36 &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77”, i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New York: Pica Press, 1982, p.155, 242. 如此来看，在斯大林时代，联盟介入了本应由加盟共和国管辖的语言政策调整，这一做法不符合宪法规定。但就其调整内容而言，只是将俄语作为第二语言引入小学教学，并未违反“……确保学校教学以民族语言进行”这一联盟宪法要求。而苏共中央1958年12月提出语言改革方案，则变相违背了宪法上述规定。

⁴ Ivan Dziuba, *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n? A Study in the Soviet Nationalities Problem*,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The Camelot Press Ltd, London and Southampton, 1968, pp. xvi, 150.



权以及可以退出联盟的条款，强调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将教育由联盟统一负责，¹ 同时宪法明确俄语的地位与作用，那么，斯大林 1938 年开始的将俄语列为中小学必修课就完全合乎宪法原则。在坚持这一双语教育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俄语教育，使其逐渐成为苏联的通用语，将在有助于增进不同民族交流及融合的同时，最大限度缓解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潮。²

这里对前苏共中央在语言政策领域的另外两个失误做一简单概括。一是过分强调语言政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自斯大林开始，苏联政府“事实上一直将通过语言同化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阶级团结作为将各民族融为一体的风险最小的办法。”³ 在乌克兰，“语言领域，是苏联领导层创造新的苏联民族与乌克兰人维持其民族认同的战斗前线”。⁴ 然而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对于人口规模较大、有特定文化传统、有民族聚居地域，特别是历史上曾建立过国家或曾谋求独立的少数民族来说，语言同化，未必就能实现其与主体民族的融合。以爱尔兰为例，在 16 世纪，爱尔兰语还是爱尔兰人的主要交流语言。17 世纪中期，随着克伦威尔征服、平定爱尔兰，特别是 1800 年的《联合法案》(Act of Union) 通过后，英国大力强化在爱尔兰的英语推广政策，到 1850 年，仅有 45% 的爱尔兰人还使用爱尔兰语，到 1891 年，这一比例仅为 19.2%。⁵ 然而，1922 年，爱尔兰依然通过武装斗争脱离英国赢得独立。

前苏共中央在语言政策的第三个失误，是双语政策仅针对非俄罗斯民族，不利于民族交融。俄罗斯民族是苏联事实上的领导民族，虽然没有这方面相关数据的统计，但一般认为，俄罗斯民族在各加盟共和国领导及管理阶层、甚至警察队伍中所占的比例，要高于其相应的人口比例。⁶ 但是，俄罗斯人学会使用当地语言的比例很低。有学者对 1970 年前苏联人口统计进行了分析：生活在非俄罗斯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占非俄罗斯共和国总人口的 22.9%，但其中只有 3% 能讲所在地区的语言，⁷ 这显然不利于俄罗斯人与其所在共和国民族群众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四、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前苏共中央在语言政策领域的失误以及其与非俄罗斯共和国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除语言因素外，文化领域的其它因素以及政治、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

¹ 1966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建立了苏维埃联盟教育部，将各共和国的教育部以及初等教育体系直接纳入其管理。有关非俄语学校的课程设计，俄语的教学学时，学制以及考试要求等，都纳入中央管理。在 1930 年代，斯大林将高等教育纳入联盟统一管辖，但也因此招致加盟共和国反对。Roman Szporluk, *Nationalities and the Russian problem in the USSR: A Historical Outli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7, no. 1. 1973, p.37.

² 那么，从 1923 苏联成立，至 1989 年解体。苏联有没有机会对宪法做如上修改，以实现列宁提出“达到愈来愈紧密的联邦制同盟”呢？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地位，而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假如斯大林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调整，把苏联转变为单一的共和国，最终完成各族的政治整合，结束列宁提到的“过渡”时期，在当时的苏联的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下，这样做应当不会有什么阻力。所以在二战结束之后的 40 年代后期，是苏联修订宪法、使联盟-联邦制转型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最佳历史时机。见：马戎，“斯大林是否在民族问题上犯了历史性错误？”《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46 期（2008 年 2 月 2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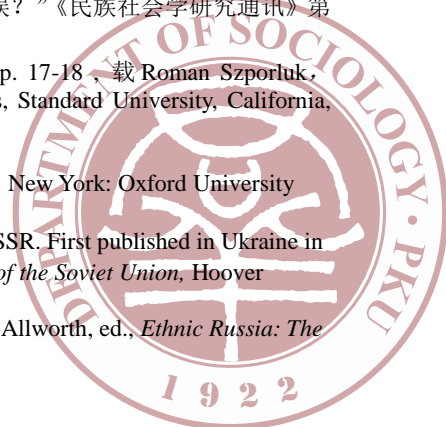
³ Roman Szporluk, “Nationalities and the Russian Problem in the USSR”, 1973, pp. 17-18. 载 Roman Szporluk, *Russian,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2000, pp. 1-27.

⁴ Orest Subtelny, *Ukraine—A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9, p. 525.

⁵ Riagian, Pdraig O. *Language Policy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reland 1893 – 199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5.

⁶ Roman Szporluk, *Russians in Ukraine and Problems of Ukrainian Identity in the USSR*. First published in Ukraine in Seventies, 1975, p71. 引自：Roman Szporluk, *Russian,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2000 pp. 71-107.

⁷ Ruslan O. Rasiak, “The Soviet People: Multiethnic Alternative or Ruse?” in Edward Allworth, ed., *Ethnic Russia: The Dilemma of Dominance*, New York, 1980, p.166.



同样会引发民族主义情绪，在很多情况下，民族主义情绪可能是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或者一种因素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另一个因素上得到更多反映。康纳（Walker Connor）曾提出：“观察者往往未能感受到种族民族主义倾向的抽象本质。因此不难理解，在研究某一族群不合的实例时，研究者更倾向于从易于识别的特征来对其进行分析。因此，乌克兰的动荡往往被解读为抵御俄语入侵、维护乌克兰语的努力。”他进而质疑，“语言是乌克兰民族认同的基本要素呢？还是语言其实是一个次要要素，只是在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斗争过程中，上升为民族的象征？”他的结论是：“即使语言、宗教、经济地位，或者其它任何可以识别的文化特征都发生巨大变化，民族认同也许会依然存在。”¹当然，民族认同不等于民族分离主义，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当然会有自身的民族认同。这里，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解读 Walker Connor 的上述观点：少数民族本身的语言、宗教、经济地位（当然是提高）等的巨大变化未必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决定性要素。从这个意义来说，或许可以对前苏联在语言政策领域的失误归纳如下：过分重视语言的作用，以致超越宪法授权，希望通过推广俄语来加速民族融合的过程，但反而引发少数民族民族情绪的激烈反弹，强化了业已存在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成为前苏联解体的文化因素之一。

【译 文】

《多民族国家：列宁与斯大林时期的帝国和民族构建》²

A State of Nations: Empire and Nation-Making in the Age of Lenin and Stalin

Ronald Grigor Suny & Terry Martin 主编

Introduction（导言）

Ronald Grigor Suny & Terry Martin 著，孙昉译³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历史研究者曾经热衷的关键词汇已然转变。“国家”和“社会”，“知识分子”和“贵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曾在一系列的论辩中被交替审视。但随着学者开始质疑社会范畴(social categories)的相对稳定性，并且思考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范畴时，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认同、叙述以及意义。在此过程中，此前研究中适用的关键词汇就出现问题了。历史学家们对阶级利益越来越丧失兴趣，而民族——这一之前关注度少得可怜的话题，转而成为新的研究焦点。在数十年的俄罗斯中心主义（Russocentric）“垄断”之后，为数不少的历史学者开始关注非俄罗斯的其他周边群体，或是研究针对其他民族（nationalities）的“宗主”政策（metropolitan policy）。本论文集，帝国、民族与国家是各项研究的关键词，学者借以探索苏联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权威的代理者。编者和作者一直希望能够对苏联这个多族群国家的历史进行新的阐释，本书即是一个开端和尝试。

作为理解东欧共产主义的尝试的一部分，有关苏联的较为严谨的学术研究发端于冷战初期。学者们争先进入“地域研究”。苏联研究与东中欧国家的研究相伴而生，被用来审视发生在这块大陆上的新的政治分裂。然而，讽刺的是，那些在“欧洲的其他部分”辛勤耕作的人通常将自己

¹ Walker Connor, Nation-Building or Nation-Destroying, *World Politics*, Vol. 24, No. 3, Apr., 1972, pp. 336-338.

² *A State of Nations: Empire and Nation-Making in the Age of Lenin and Stal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³ 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1 级博士研究生。

